

《格萨尔》

考察纪实

徐国琼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《格萨尔》

考察纪实



徐国琼

(滇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：沈正德

封面设计：孟嘉福

《格萨尔》考察纪实

徐国琼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11 插页：4 字数：187 000

1993年8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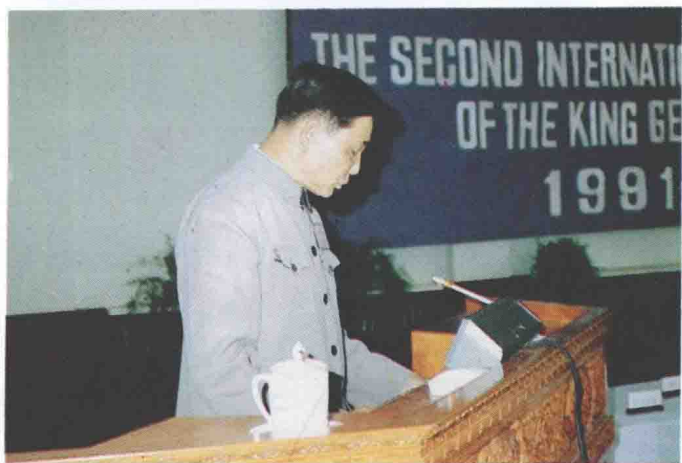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ISBN 7-222-01314-8/I·314

定价：5.80 元

十世班禅大师听取云南《格萨尔》工作汇报后，向徐国琼赠送礼品。



徐国琼在第二届《格萨（斯）尔》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



▲ 相传格萨尔用过的弓箭和盾牌（云南德钦地区）
 流传于民间的部分《格萨尔》抄本





拉萨罗布林卡措基颇章（湖心亭）内格萨尔壁画



格萨尔凯旋归来接受守臣敬献哈达（康区唐喀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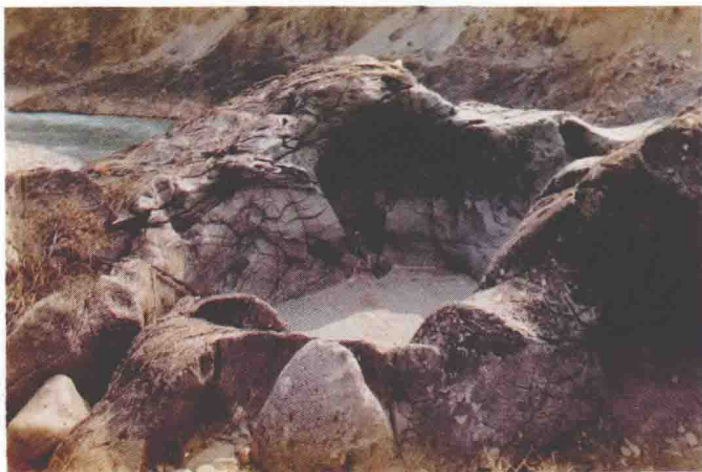
格萨尔召集群臣会商出征（康区唐喀）

▼ ► 仙鹤向格萨尔送信（云南德钦民间泥塑）
传说中的姜国都城遗址（位于云南中甸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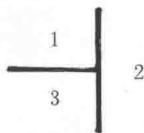
相传格萨尔和姜国内政大臣协钦白图相战的战场——云南中甸别里塔海（碧塔海）



相传扎拉泽嘉妃子戎萨阿曼跳舞的舞场（位于云南中甸）



《格萨（斯）尔》艺人在演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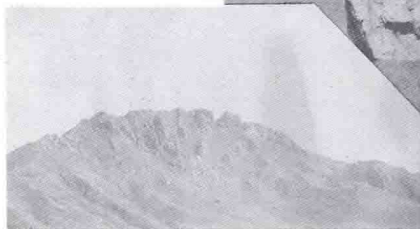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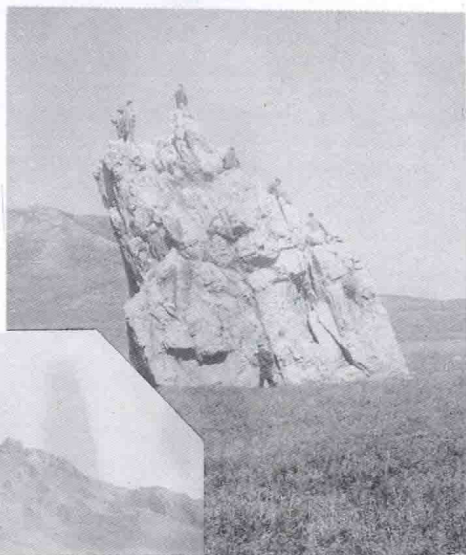


- 1 西藏“神授”艺人桑珠
- 2 西藏名艺人玉梅
- 3 内蒙古艺人桑布拉

西藏著名的《格萨尔》艺人扎巴



相传为格斯尔
射开的箭口山的箭
口及其拴马石（位
于内蒙古巴林草原）



自序

1956年春，我在中央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期间，从1956年3月号《民间文学》上，读到了老舍同志同年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的《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》。《报告》中提到我国藏族地区流传有一部《格萨尔王传》史诗。史诗描写格萨尔王的英雄事迹，很有价值，它还流传在民间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很想到藏区去搜集这部史诗，但苦于没有机会。不久，我调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。这时我又在《青海湖》文艺刊物上读到了一篇名为《南赡部洲的雄狮盖舍尔王》的藏族民间故事。故事气势宏伟，内容引人。我想：“盖舍尔王”，可能就是“格萨尔王”。由于当时工作性质相同，更希望能立即到

青藏高原去考察一番。

不久，愿望终于实现了。组织上同意我的多次要求，于1958年1月调到了青海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会。从此开始了参加《格萨尔》史诗的考察、搜集和整理、研究工作。在青海工作了24年以后，于1981年调回云南，仍从事《格萨尔》工作。在从事这一工作的30多年中，头20年，我工作的重点是野外作业。主要是下乡实地考察，多方搜集资料。后10年来，除仍参加发掘、抢救资料外，较前相比，加强了研究工作。从50年代开始至今，我先后对青海、西藏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、内蒙等流传有这一史诗的不少地区作了多次实地考察。就是在《格萨尔》被打成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我也没有抛弃这一工作。我一面冒着极大的危险，将57种共71本《格萨尔》珍贵抄本、刻本，秘密埋藏地下，我一面还在向知心的藏族同胞打探有关资料。从50年代开始至今，从长江、黄河源头，到羊卓雍措湖畔；从史诗的诞生地安木多岭地，到传播史诗的圣地拉萨；从内蒙古的巴林草原，到云南的卡哇格博雪山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30多年间，我先后在各地拜访了许多著名的《格萨尔》“仲肯”（艺人）。虽然多数“仲肯”

如青海的合尔纳、才旦加，四川的登巴江才、仁清达吉，西藏的东孔、扎巴，云南的阿尼·阿曼，内蒙古的琶杰等著名《格萨尔》、《格斯尔》艺人都已先后谢世了，但他们说唱史诗的歌声，仍然回荡在我的耳边；他们给我介绍史诗时的音容笑貌，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30多年来那些亲身抢救史诗的经历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
开始从事这一工作的50年代，我没有想到30多年后，我仍然还在从事这一工作。更没有想到今天会写这本小册子。当时随身携带的“小本子”，也只不过记下一些当时得到的情况。当时的记录，现在重温，悔恨有的记得太简单了，如今只好靠回忆加以弥补，但总是感到不足。本来早在1959年的12月18日，在北京召开的“《格萨尔》工作座谈会”上，主持这次会议的老舍同志曾说：“参加搜集工作的人，不仅要搜集史诗作品本身的各种资料，还要把民间考察的情况很好地记录下来，这是研究工作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。”（录自会议记录）但当时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。1978年11月18日，在北京专门给周扬同志汇报《格萨尔》工作情况时，周扬同志又给在座的贾芝同志和我讲：“民间调查的情况，也要很好记

下来，不然人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（指《格萨尔》资料）从何而来。再说一些老艺人死了后，一些情况后人就知道了。”（录自汇报时的记录）1983年12月9日，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第二次理事会上，钟敬文老先生给我题《藏族雄篇格萨王》一诗后，谆谆对我说：“民间文学，重在实地考察，然后才是研究。你参加《格萨尔》发掘工作较长，一定有许多亲身经历，一定知道不少民间实际情况，这是第一手材料，是书本上难以见到的，应该把它写出来，这对研究工作很重要。”以后，贾芝、黄静涛等同志都多次对我说过，应该把实地考察的情况早点写出来。由于诸多原因，迟迟没有动笔，可心中时时感到没有了结这桩心事。直到1989年，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支持下，我才边翻阅幸存下来的20多本笔记，边开始动笔，将部分亲身经历的情况，写成了这本小书。还有许多经历，如有机会，以后再写。

当撰写这些经历时，我深深感到，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，如果没有广大藏族人民和其他有关民族人民的支持，我是无法进行这些考察的。尤其是广大《格萨尔》艺人，当他们知道我是真心喜爱《格萨尔》以后，他们便把我

作为知心人看待。青海的夏吾才郎，把本来不愿告诉他人的情况告诉给我；合尔纳老人，把自己珍藏的祖传抄本赠送给我；四川的登巴江才，把“神授”的秘密如实告诉给我；甘孜的丹真札巴，把家中珍藏的缮写本无偿地赠送给我，还为我当时生病住在医院里的爱人祈祷。青海泽库和日草原的民兵，在生死关头支持我把已到手的资料保护好。驻守昌都地区达马拉山的装甲部队，护卫我乘坐的卡车在呼啸的枪声和密集的枪弹中闯过了险关。昌都卧龙街的降央曲措，将祖传的“传家宝”格萨尔唐喀和两部抄本盛情赠送给我。如此等等，使我深深感到，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我的考察，那将是寸步难行的，更不可能搜集到那些珍贵资料。如果这些考察纪实，还可作《格萨尔》研究工作参考的一份资料，那首先应归功于支持这一工作的人们。

《格萨尔》这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史诗，至今还活在广大民间艺人口头上，这在世界史诗发展历程中是个奇迹。也正是这个奇迹，迫使我们应该及时考察，及时抢救。从整个《格萨尔》工作来说，在各有关省、区共同努力下，抢救工作已取得了空前的成绩。但还有不少地区，应该继续考察；还有不少作品，

应该及时抢救。西藏81岁的著名老艺人札巴，到辞世的那天为止，虽已说唱录音了24部半，但他所能唱的，毕竟尚未全部录完，他便一去不复反了。云南德钦86岁的阿尼·阿曼，他虽能唱10多部，但一部也还未及录音，他便与世长辞了。逝去一位艺人，就是失去一个《格萨尔》书库。客观形势要求我们，抢救工作仍是件刻不容缓的事，考察仍应继续进行。

伟大的民族，创造了伟大的史诗。伟大的国家，对伟大的史诗给予了极大的重视。《格萨尔》发掘抢救工作，从50年代即已开始。十年动乱期间，《格萨尔》被打成“大毒草”，那是一场恶梦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《格萨尔》得到平反，发掘抢救工作得以陆续恢复。继而这一工作被列入了国家“六·五”、“七·五”和“八·五”期间重点科研项目。现在这一工程虽已取得了巨大成绩，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继续。30多年来亲身体会：像这样巨大复杂的工程，必须以国家民族事业为重，实干苦干，常年如一日，坚持一个“恒”字。只有这样，才不辜负国家民族的期望。希望这一工程能够善始善终，百尺竿头，再进一步，更好地做好这一工作。

1991年12月20日于昆明